

组织起来就会“无敌于天下”

——重温毛泽东《组织起来》的讲话

□ 赵园园

编者按

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该讲话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组织起来》中蕴含的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尤其是通过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力量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对新时代更好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作用、对象范围、根本方法和作风保障，是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冲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刻，重温这篇重要文献，对于发挥党的先进性和引领力，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汇集各方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千里奔流、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现实意义。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日军实施“三光”政策、国民党进行重重封锁、连年自然灾害，以至于毛泽东惊呼面临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

天没有被盖。”在这一背景下，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开篇指出，大生产运动就是“组织起来”的运动，“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他指出边区各方面的成绩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通过组织，八路军新四军一支军队当打仗的军队和生产的军队两支用，具备了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套本领。这样，一方面军队实现自己供给。“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他指出军队完全实现自己供给是一个创造，对于民族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减轻了群众负担。“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

正是因为组织起来，边区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边区各方面工作走上了轨道。实践充分证明，整个边区克服严峻困难走上轨道，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组织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

毛泽东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

他认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一方针的对象是党政军民全体人员，范围是根据地的各个角落，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广大的运动、广大的战线。接着他还分析了组织群众的形式：“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指出，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综合群众的经验，形成各种合作社可以把群众力量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并指出要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逐步将更多的人，包括妇女群众和二流子，广泛组织起来。

毛泽东判断，组织群众劳动就一定能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国家。“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历史和实践证明他的判断是科学正确的，将分散的群众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不仅可以打败任何敌人，还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

共产党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不容易，用什么方法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让群众心甘情愿、充满激情地投身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中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毛泽东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根本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同群众相结合首先要深入群众生活，向群众学习。他指出，共产党员要主动走进群众，经受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群众中有着成千上万的“诸葛亮”，共产党员要在群众中虚心向群众学习。

同群众相结合还要总结群众经验，为群众谋幸福。他认为要把群众的经验综合起来，形成更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通过宣传、动员，让群众行动起来，从而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改善群众生活与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关系。只有全心全意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才能获得群众真心真意支持，共同致力于解决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问题。他强调，“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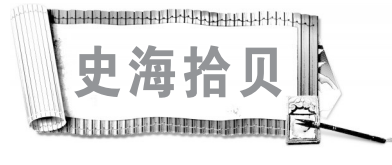
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结合起来

工作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有良好的作风保障。毛泽东鲜明指出，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人，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接下来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军队中军阀主义和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存在的问题、危害和解决办法。他指出军阀主义作风是国民党军队脱离群众的表现，我们军队必须在军民、军政、军党、官兵、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干部等相互关系上坚持官长必须爱护士兵、军队必须爱护人民、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等正确原则。他还批评了八路军新四军中存在的一些骄气、不讲理、听不进批评话等毛病。

他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性质都是脱离群众，需要通过开展批评、揭发错误等方式进行发现和改正。这就要求加强群众观点，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他告诫大家，虽然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作风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不能自满，要继续作自我批评，继续求进步，因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容易再生。“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党建文献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四军历史上，陈毅统战工作的佳话广为流传。黄桥决战胜利后，中央军委专门批转了陈毅领导新四军在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毛泽东批注：“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陈毅统战艺术至今仍值得当前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发扬。

重视宣传教育，促进日伪敌军觉醒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陈毅领导新四军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对宣传教育工作作过许多指示和论述，而且经常直接领导和参与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

1940年8月，新四军进驻黄桥后，陈毅推荐其妻子张茜到新四军苏北政治部《抗敌周报》参加油印工作。9月，新四军占领姜堰后，陈毅亲自委派专人赴外地购买印刷设备器材，还专程去印刷厂看望印刷工人，鼓励他们为新四军抗战印好书报刊。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编印大量宣传品及日文报刊，如苏北支部的《日本兵队之声》，苏中支部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新四军广泛发动群众，沿路发放、张贴宣传品，甚至穿过伪军哨岗直接发放到伪军据点。这些宣传品以鲜活的事例反映出日伪军内部的黑暗，官长对士兵的压迫，不少日伪士兵产生了厌战、怠战、反战情绪。

陈毅还创造性地运用党中央对待日伪战俘的政策，从多方面施之以艰苦细致的教育转化工作，新四军制定《敌军政治工作纲要》，明确指出“正确执行优待日军俘虏的政策，可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从事中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善待日军俘虏，每日有计划地对日俘进行思想教育，以1至2小时与他们正式讲学，逐渐启发日伪军俘虏的阶级觉悟，成功将一批日伪俘虏争取过来。被释放的日伪俘虏以其亲身经历，在日伪军中进行策动，起到了很好的攻心瓦解作用。

讲究斗争策略，建立党的“外围军”

在革命战争年代，陈毅讲究斗争策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化敌为友，建立党的“外围军”。

1939年，陈毅从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过江来到吴家桥，当时苏北的军事力量除了少数八路军和新四军外，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占领南通、徐州、连云港等水陆交通线上重要城镇的日伪军；二是控制苏北大部分地区的韩德勤部，属于蒋介石嫡系，拥有兵力七八万人；三是驻扎在泰州、姜堰的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等部，拥有兵力2万多人。陈毅仔细分析了苏北局势，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1939年7月，陈毅进泰州城会见李明扬与李长江，达成合作意向，之后又两进泰州，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使“二李”确立了中立立场，巩固和“二李”统一战线。

1940年6月，在韩德勤蛊惑挑拨之下，李长江指挥13个团10倍于新四军的兵力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该部被迫奋力反击，最终歼灭李长江部3个团的兵力，使得李长江部全线溃退。在即将进攻泰州之际，陈毅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他指出：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陈毅主动与“二李”议和，释放俘虏并退出所占“二李”防区。陈毅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为黄桥决战我军胜利奠定了基础。

善于以文会友，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陈毅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充分利用在诗词、书法、围棋等方面造诣，广泛交往各界名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政府、群众团

陈毅如何做统战时期工作

□ 庄广雷

体工作。如其在《记韩紫石先生》所言“余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

1941年秋，陈毅为打开盐阜地区工作的新局面，登门拜访盐阜地区著名人士庞友兰，请其为抗战事业献计献策。但是庞友兰认为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新四军人少枪少，想要在盐阜地区立稳脚跟并不现实。陈毅“三顾茅庐”，才得以见其真容。在交谈中，陈毅措辞诚恳，态度谦恭。两人说文道武、谈论古今，诗歌词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谈，经过多次交流，庞友兰改变了对新四军的看法，从陈毅身上看到了新四军的力量所在，积极为抗日出谋划策，被选为盐阜区参议长。陈毅对此高度评价，并赋诗赞他“丰姿再现海安身”。

陈毅以他的真诚相待、渊博知识团结了一大批开明地主绅士、知名人士，使他们能理解、同情和支持新四军的抗战。他还邀请外地知识分子来苏北参与抗战，他写出一封封情意切的书信，通过地下组织转交到各大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手中，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投身革命，使苏北会聚了民主斗士邹韬奋、新闻记者范长江、音乐家贺绿汀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在此基础上，为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作用，他倡导建立“名人文化村”，成立湖海文艺社，关心学社发展，亲自参与学社活动并大量投稿，推动了文化抗战的蓬勃发展。

争取海外人士，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陈毅还把做好国际友人、华人士的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不懈地努力，在新四军中树立起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旗帜。

1945年5月，陈毅邀请美国太平洋学会会员、《太平洋事务》驻远东特约记者汉斯·希伯到盐城采访，陈毅热情欢迎其到来，安排希伯到周边的乡镇、村庄、部队采访，与新四军将领、士兵、农民等进行多方面接触。希伯写出《重访新四军占领区》等多篇报道，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抗战期间先后有30多位记者写了有关新四军的报道，从而使新四军声名远播，打破了敌对势力的舆论封锁。同时通过反复沟通，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受陈毅邀请对新四军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并在陈毅等人介绍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积极组织在华外国人士，组建新四军的“反战联盟”，如“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特别是组织流亡中国的朝鲜人成立“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对于流亡中国的朝鲜人，在政治上与人平易近人，在生活上给予国际友人的待遇，在工作上给予指导和信任，朝鲜人李成镐被新四军第三师委任为抗大五分校教育长。1942年春，经过新四军这个革命熔炉的熏陶，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在苏北工作的朝鲜人王信儒、李成镐、卢希必等人成立“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他们到日军据点附近，甚至不顾炮火的危险，靠近阵地前沿喊话，不少朝鲜士兵倒戈逃跑，成效显著。

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实现长效化运行

□ 晏 然

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化运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思想是内在自觉，制度是监督约束，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常抓不懈。

高度重视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引导党员干部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筑牢信仰之基、从政之基、廉政之基。共产党人的“心学”，常修才能常新。从根本上说，抵御外部环境的影响，保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初心，要靠个人加强修养而成。

一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自我修养。理论的学习应该和实践修为相结合。理论学习的目的是在日积月累中增加修养与顿悟，而实践修为的意义在于将人的精神世界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将党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理论学习一定要认真自觉，坚持不懈，真正发自内心去热爱，感兴趣，沉下心，深进去。

二是在组织中强化修养。共产党人的“心学”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需要将内力与外力、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通过组织管理和其他同志的帮助，进行定期“保洁”，避免外部环

境的不良影响，补充“正能量”。衡量党性教育的成效，不在一时的感染、触动，而在党性修养自觉性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集中教育活动主要侧重从党建角度出发，讲中央精神、组织要求、模范案例、警示教育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总的思路还是要将组织活动的“要我学”与“我要学”的自觉性相结合。

三是在勤学善思中创新，提升修养。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敢于愿干积极干，又要能于干善于干。共产党人的“心学”必须与创新意识、担当精神以及主动作为相结合，修好创新之心。

高度重视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

全面从严治党，始于“心学”、落于制度，要以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严格的制度执行作保障。

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制度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把制度建设贯穿于从严治党全过程，统筹谋划和部署，陆续出台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导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下一步，要进一步做好党内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等工作，使制度内容更加科学规范，制度修订更加及时迅速，制度监管更加行之有效，制度规章更加深入

人心，从而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执行严格、监管有力。

在制度执行中，应严字当头，加强纪律建设，树立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党的十九大首次把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共同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纪律建设的关键在于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完善纪检监察问责制度，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加大对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把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尺”和“准绳”。

制度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对制度的执行上来。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被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员干部对党纪党规的遵守要落实到工作中，自觉把制度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外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制度的执行与实施必须落实到每个组织体系中，从真抓好落实，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养成从严习惯，才能自下而上形成凝聚力。

把修炼“心学”与执行制度结合起来

人既是制度主体，又是制度客体，人与制度密不可分。制度规范

